

第七章——父母权威

(1) 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我的家庭有一部分农村背景，在那里一直有一种不成文的观念：最小的女儿将来要负责照顾年老的父母。正因为如此，家里人总想把我留在身边，不让我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母亲从小就把我培养成一个习惯于服从和被控制的人。

(2) 她总会追问我：“是谁让你这么做的？”好像我必须时时刻刻听命于谁，否则就该受到惩罚。除此之外，我身边仿佛始终笼罩着一种看不见的压力。所有人——甚至那些刚接触我们家的人——都会被默默拉进这种氛围里。他们会来劝我、拦我，如果我做了什么让家里不高兴的事，他们甚至会故意不再跟我说话。

(3) 母亲对我的控制，几乎像一张没有漏洞的网。小时候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要告诉我。”我问她：“连我在厕所里做什么也要说吗？”她回答：“连你脑子里想什么都要告诉我。”这句话后来深深影响了我的人生，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慢慢被人排斥在社交圈之外。家里人经常背着我聚在一起，理由总是“你还小”，可他们私下里却总说我是那个“什么都会说出去的人”。

(4) “什么都要说”这件事，让我渐渐把自己的焦虑和不安带给身边的人，也把别人隐藏的问题全都暴露出来。我会在事情发生的当下，直接当着对方的面批评自己、批评别人，结果无论走到哪里，气氛都变得紧张压抑。更糟的是，每当我不得不配合某个谎言时，我都会痛苦到几乎发疯。

(5) 我一直被当成一个不成熟的人对待，时时刻刻都像活在监视之下。母亲常常替我“决定”该怎么说话，她总觉得我不懂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每次遇到事情，她都会先问我准备怎么说，然后逼我换一种说法。久而久之，我连自己到底该说什么都弄不清了。

(6) 在家里，我的感受和权利几乎从来没人真正重视。后来的人生里，我也见过很多家庭——有的比我更糟，有的比我幸福一些，但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矛盾和伤口。可奇怪的是，在那些并不完美的关系里，又总存在一种微妙的连结。只要人不过度怨恨、不彻底反抗，那种关系有时反而会把人慢慢推向更好的方向。

(7) 我曾经非常叛逆，也完全看不出我的家人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但与此同时，每当我离开他们、独自待在别的环境里时，总会有人夸奖我身上一些连我自己都没发现的优点。那种时候，我会感到一种巨大的轻松，因为终于没有人时时压着我，我也第一次感受到被平等对待是什么感觉。

(8) 他们给我的人生设置了很多阻碍，所以我每一次真正重要的成就，都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可与此同时，很多人又把我的成功归功于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母亲——她在和父亲分开之后，一个人把我们养大。尽管经历了那么多，我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说法并不完全错。因为我确实依赖那个家庭活下来，而母亲给予我的那些支持，也的确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9) 其实我们彼此深爱，但各自背负的家庭角色，还是让我们在心理上越来越疏远，好像彼此早已不是站在同一边的人。那时候，连很多关于家庭权威的民间俗语都带着一种羞辱意味，

比如：“把你家的母羊拴好，我家的公羊放出来了。”所以，我所承受的压迫，并不只是来自家人本身，也来自那个教会他们如何“教育孩子”的社会。

(10) 家庭中的权力，其实和其他一切权力一样，都源于人的自由意志。它并不是直接被宣布成立的，而是在生活中慢慢被默认、被合理化，甚至从事情本身的逻辑来看，也似乎顺理成章。理论上，父母在发生亲密关系时，就已经表达了想要孩子的意愿；而孩子则像是在出生那一刻“选择”了家庭而不是死亡，因为婴儿若没有大量而持续的照顾，根本无法存活。因此，家庭权力也成了人一生中最早接触到的一种权力关系。

(11) 家庭是一个人最先进入的社会组织。人在这里学会最初的道德观念、行为规则，以及与他人相处的基本共识。正因为如此，家庭权力本该是一个极其重要、必须被认真讨论的话题。可几千年来，人们却很少真正去谈它，仿佛父母与孩子之间越界、侵犯彼此权利，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事。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去侵犯他人的权利。

(12) 巴西2002年的《民法典》把“家庭权力”²⁰⁴（在1916年的《民法典》中被称为“父权”）定义为父母或监护人对孩子所拥有的一系列权利与责任。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权力本应是中立的。但人本身并不完美，我们生活的社会也同样如此。因此，真正能让这种权力变得健康的方式，只有在人与人的相处中拥有更多的爱与包容。。

(13) 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父母把孩子培养成“为自己服务的人”，把他们当成自己生命的延伸。这种做法其实很容易出现，因为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时，对一切都一无所知，只能在家庭中学习成长——而家庭，本来就是一个人的生命里最重要的地方。

(14) 可奇怪的是，这样的成长方式有时又确实会给孩子带来一些积极影响。父母不断施加道德要求，某种程度上也确实让孩子学会了责任感和道德感。而且，这些孩子通常也更早学会劳动。毕竟，人只要劳动，本质上就是在为别人提供服务。

(15) 如果父母越过了孩子的自由意志，阻止他们追求自己真正想走的路，把他们从正确的人生方向上拉开，那么孩子后来的人生道路，父母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16) 这种影响甚至可能延续到下一代，让人更加意识到父母在自己选择与行为上的责任有多大。曾经，使徒们问过耶稣，一个人生来失明，是否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²⁰⁵。我们当然不会真正替父母“偿还罪过”，但很多时候，我们受到父母行为的影响之深，几乎就像是在替他们承担后果一样。

(17) 家庭权力对一个人的人生影响实在太大了，因此巴西的法律、法学理论以及司法实践，通常都认为它具有半公共性质，不可以随意放弃、交易，也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而失效。当父母失去这种权力时，《儿童与青少年法》²⁰⁶会提供不同的安排，把孩子送往能够替代家庭功能的照顾体系中。

(18) 家庭这个结构，与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直接相关。没有家庭，人往往会面对一种巨大的精神空洞。但家庭权力和所有权力一样，并不是没有边界的。理论上，当孩子年满十八岁后，在个人生活上就不再隶属于父母或亲属，即使经济上仍然依赖家庭也是如此。

²⁰⁴ 巴西《民法典》第10.406/2002号法律，第1630条——“未成年人受父母权的约束。” 来源：Planalto :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leis/2002/L10406compilada.htm.

²⁰⁵ 《圣经·约翰福音》9:2——“他的门徒问他：“拉比，这人生下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

²⁰⁶ 1990年第8.069号法律 — Disponível em: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leis/l8069.htm.

(19) 成年之后，一个年轻人也开始真正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人生后果，而亲属原本承担的一部分责任，也会逐渐结束。因此，一个人需要开始规划自己的经济独立和职业道路，最好能够从事那些自己真正感兴趣、愿意投入热情去学习和发展的事情。

(20) 很多时候，家人会利用经济上的控制，来要求已经成年的年轻人继续服从自己，甚至继续替他们决定恋爱关系、生活方式和未来方向。但一个健康的家庭，本应建立在互相支持、彼此分享，以及责任逐渐交接的基础上。理想的状态，是家人帮助年轻人平稳地进入成年世界，尊重他们的隐私，同时也保留一些童年时期的积极部分，比如运动和兴趣爱好。

(21) 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年轻人能够没有经济压力地专心读书。不过，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应该学会自己做饭、洗碗、洗衣服，照顾自己的卫生，也照顾生活环境。因为这些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成长教育。甚至哪怕只是适度地下地干点农活，也能让年轻人学到很多东西——毕竟，人类想要拥有食物，本来就离不开土地。

(22) 如果年轻人已经有一定经济能力，就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开始承担一部分自己的开销。而对于经济条件有限的家庭来说，年轻人适当地帮忙分担家里的经济压力，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23) 家庭中的权利与责任共享，不只是金钱问题，也包括家务劳动，而且无论男女都一样。年轻人越独立、越有能力，对他们越好。而学会管理财物和承担责任，本身也会让人成长。不过，像家里的车这类财产，也只有在年轻人足够谨慎、负责和值得信任的时候，才适合交给他们共同使用。

(24) 与此同时，从少年走向成年，本身也会给很多年轻人带来巨大的焦虑。我当老师的时候，就曾在班级里明显看到这一点。那时的我，其实也才刚刚接近青春期结束不久，但我还是做了一张表格，用来帮助学生理解：责任是如何一点点从父母转移到年轻人自己身上的。

(25) 后来，我在课堂上讲解这张表时，明显感觉到学生们的状态稳定了很多。他们开始更理解自己，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学习能力很强、凝聚力很高的班级，甚至后来超过了“A班”，还经常和“A班”发生冲突。在那所学校里，班级字母其实对应着这座城市的社会阶层。“A班”基本都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孩子，比如校领导、主管之类家庭出身的学生。

(26) 我首先告诉学生们，监护人之所以会对他们提出要求，是因为父母本身需要对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正因为如此，父母才会希望他们做出正确的事情。我也告诉他们，这种要求未必完全是坏事，因为它能让人慢慢学会追求好的结果。毕竟，随着长大，人生后果终究会由他们自己承担。所以很多时候，愿意听父母的话，确实能少走一些弯路。

(27) 接着，我向他们解释，他们正处在人生里从孩子变成大人的阶段，而年龄增长，本身也意味着责任会一点点从父母转移到他们自己身上。所谓“成为大人”，其实就是开始学会为自己负责。

(28) 在那张表格里，我把成长划分成一种逐年变化的过程：每长大一岁，就多10%的“大人”。十三岁时，是90%的孩子、10%的成年人；到了二十二岁，则变成99%的成年人，只保留1%的孩子。我告诉他们，那最后保留下来的1%，其实非常重要，因为那代表着一个人继续拥有更新自己的能力、保持敏感，以及保留勇气。

(29) 我还给他们提出了一些与父母共同生活时的基本规则，比如不要把个人物品随意丢在公共空间里，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弄脏的地方收拾干净。这些规则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舒服地生活，同时又不给别人带来额外负担。

(30) 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家其实只需要一些所有人都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就像公共空间一样，这样彼此相处才不会变得混乱。很多公共规则其实并没有明文写出来，人们只是通过后果慢慢学会它们。比如，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东西随手丢在公共场所，东西可能就会被别人拿走；如果随地乱扔垃圾，不仅可能被罚款，还可能堵塞下水道，引发水灾和疾病传播。在家里，后果未必会这么直接，但这些道理同样适用。

(31) 很多孩子和年轻人，其实也会在家里“压迫”自己的亲人。他们拒绝承担属于自己的家务和生活责任，却理所当然地享受父母的照顾。有时候，父亲、继父，或者家里的其他成年人自己也不愿承担责任，于是孩子自然也会被带偏。但无论是谁，都应该遵守共同的家庭规则；如果不遵守，也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

(32) 孩子对父母和长辈的爱，或者带着敬畏感的尊重²⁰⁷，是家庭权力里非常核心的一部分。在家庭关系中，孩子通常需要服从父母或监护人，直到他们拥有足够独立生活的能力。因此，在成长过程中，对父母产生某种敬重，其实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33) 可惜的是，很多长辈会慢慢变得自负，把“尊重”误认为“恐惧”，甚至让孩子对他们产生过度害怕，就像他们是不能违抗的神一样。而很多时候，他们自己甚至意识不到这种行为已经变得不正常。

(34) 在我们的文化里，家人对孩子使用肢体暴力²⁰⁸，其实一直都很常见，哪怕这种做法违法、有害，而且并不被提倡²⁰⁹。很多人觉得，教育孩子不可能完全不带一点心理压迫。但事实上，人更多是通过别人的行为去学习，而不是通过说教。因此，强迫和恐吓往往教会人的不是坚强，而是懦弱与服从。

(35)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养育孩子时常见的困境。一位母亲有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孩子。有好几次，孩子们差点从窗户掉下去，每次她都只能立刻冲过去阻止。最后，在确认两个孩子都安全之后，她威胁说，如果他们再跑到窗边做危险的事，就要挨打。

(36) 照顾孩子时，很多危险其实都发生得非常突然，需要人在一瞬间做出激烈反应。比如，有时候我们可能必须拍一下孩子的手，让他赶快松开危险的东西；或者猛地

²⁰⁷ “敬畏之惧” (reverential fear) 的概念——见于巴西《民法典》第153条（第10.406/2002号法律）：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leis/2002/L10406compilada.htm。

²⁰⁸ 肢体冲突 (Physical Altercation) ——巴西第3688/41号法令，《轻罪法》第21条：<https://www2.camara.leg.br/legin/fed/decllei/1940-1949/decreto-lei-3688-3-outubro-1941-413573-publicacaooriginal-1-pe.html>。

²⁰⁹ 巴西第13.010/2014号法律（俗称“禁止体罚法”）——确立了儿童和青少年在接受教育和照料时，不得遭受体罚或任何残酷、侮辱性对待的权利。可查阅：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11-2014/2014/lei/113010.htm。

把他推开，避免被车撞到；甚至为了阻止他溺水，不得不用力打他一下。这些行为本身带有暴力性，但它们并不属于伤害，而是在紧急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强制行动。

(37) 过去，我们的父母普遍认为，打几下年幼的孩子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心理创伤。但如今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在那个母亲的例子里，更好的做法，其实应该是给窗户装上护栏，或者直接锁上窗，而不是去打孩子。

(38) 我们的社会，经常通过影视作品和虚构故事，让人相信“只有暴力才能对抗邪恶”。在这些故事里，英雄往往依靠武力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智慧、理解或说服。久而久之，这种观念也影响了现实生活，使很多人——哪怕只是潜意识里——都会默认警察对所谓“罪犯”使用过度暴力是可以接受的。

(39) 曾经的我，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一种见证。直到今天，当我试着劝身边的亲人不要用攻击性的方式对待孩子时，他们还是会露出一副“你根本不懂教育”的表情。但正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明白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40) 过去的我，总觉得不打孩子的父母，根本不算在教育孩子，也无法让孩子拥有坚定的品格。甚至连《圣经》中关于“棍杖教育”²¹⁰的话，也曾让我更加相信这一点。在我看来，那些不打孩子的父母太软弱、太没有原则。如果一个人从没打过自己的孩子、没有“验证”过这种方式是否有效，那他甚至没资格来和我讨论该怎么教育孩子。

(41) 那时的我，是一个极度紧绷、近乎偏执的人。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战士”，甚至把孩子当成“以色列的小士兵”一样去培养。虽然这些错误后来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多痛苦，但今天我也明白：如果我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我就没有资格去对那些最需要听见这些话的人说话——那些充满攻击性的父母。

(42) 有一次，我的一位亲戚去巴西欣古地区的原住民保留地时，看见一位母亲。她的女儿一次又一次打碎她亲手做的陶罐，但她始终没有动手打孩子。我的亲戚受到我们文化的影响，很不理解，就问她：“为什么你不惩罚她？”那位母亲回答说，小孩子本来就会这样，等她慢慢开始觉得完整的陶罐比碎掉的更好时，自然就不会再故意打碎了。她用自己的态度证明了：耐心和理解，很多时候比暴力更能教育孩子。在这一点上，她们的文化，反而比我们的文化更成熟。

(43) 现在回头看过去，我已经能看见很多当年本可以有效的教育方式——只可惜，那时的我并没有使用它们。所以今天，我真正想给出的建议是：请用更温和、更有尊重感的方式去引导你的孩子，把他当成“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对待；同时，也请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平等地对待别人的孩子。

(44) 一个父母如果拒绝用暴力对待孩子，其实就是在实践基督教里“爱人如己”的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也几乎没有什么方式，比这一点更能真正带来好的结果。对孩子使用暴力，本身也违背了基督教的核心。基督教之所以被称作“轻省的担子”，是因为它反对让人承受不必要的痛苦；但它同时又是一条坚定不摇摆的道路，因此也有自己的原则和边界。

(45) 真正的敬重，其实来自欣赏与钦佩。想让人发自内心地产生这种感觉，最重要的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需要建立同样的尊重。教育者必须先克制自己内心想要压制别人的冲动，给孩子留下成长的空间。纪律当然仍然存在，但它应该是帮助人成长的边界，而不是压迫。

²¹⁰ 《圣经箴言》22:15，23:13-14 和 29:15。

(46) 还有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从小就在家里的生意里工作，却几乎拿不到真正的报酬，也没有机会继续完成高中之后的学业。

(47) 后来，当他想带着自己的家庭搬离父亲家时，父亲强烈反对，甚至直接把他赶出了家族生意，而且没有给任何补偿。这段经历让他根本没有能力适应外面的工作环境，后来长期陷入绝望与抑郁，最终在缺乏医疗帮助的情况下，因为癌症而悲惨去世。

(48) 一个从小没有被尊重对待的人，往往很难真正意识到自己也拥有权利。他们会把别人给予的一切，都当成“施舍”或“恩赐”。而这种成长环境，也容易让人继续去压迫别人，让人逐渐变得麻木、失去同理心，把被教育者的一切牺牲都视为理所当然，只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但压迫别人的人，同样也在冒着风险——他们可能最终迎来对方无法承受的反抗，甚至把自己深爱的人一步步逼向悲剧的结局。

(49) 让我难过的是，如果说这种压迫在男性身上还算少见，那么在女性身上，被迫活成“服从者”的情况却更加普遍。但只要这种观念被接受，它就会对所有人造成伤害。所以，它必须被所有人共同面对和反抗。很多时候，人们甚至意识不到：剥夺一个人的性权利，以及与建立家庭有关的各种权利，本身就是对家庭权力的滥用。在这种情况下，“纪律”被误解成了单纯地剥夺孩子的自由。

(50) 当然，纪律本身也确实能帮助人成长，家庭也应该教会孩子这一点。但真正健康的纪律，应该是一个人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主动做出的选择，而不是被强加的命令。过度严苛的纪律，反而会阻碍一个人形成自由、健康的心灵。

(51) 耶稣自己的人生，其实也体现了父母权力对人的影响。在迦拿婚宴上²¹¹，祂顺从了母亲的请求，也由此开始了祂公开的使命。后来，当祂的亲人来到彼得家寻找祂时，祂又表现出一种不再继续服从家庭权威的态度。

耶稣的母亲和弟弟来了，站在外面，传话给他，叫他出来。有许多人正围坐在耶稣身边，他们告诉他：“你看，你的母亲和弟弟（有些抄本在此有“妹妹”一词）在外面找你。”耶稣回答他们：“谁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呢？”于是四面观看那些围坐的人，说：“你们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圣经》马可福音 3:31-35）²¹²

(52) 一种病态的控制欲——或者说“支配欲”——会让一些人在拥有某种权力后，渐渐觉得别人属于自己。耶稣的亲人其实也没有完全例外，虽然他们的行为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害怕在当时犹太社会的紧张局势和罗马统治的敌意之下，耶稣会遭遇危险。但也正因为如此，耶稣才选择在公开场合与母亲保持距离，所以祂才会在人前表现得像“不认识她”一样。与此同时，祂那些冷静而充满智慧的话，也切断了亲人想继续对祂施加权威的尝试，并为一种超越血缘的博爱奠定了基础。

(53) 根据圣地亚哥·马丁所写的《圣母秘福音》，耶稣的表亲之所以会被别人理解成祂的“兄弟”，是因为他们当时和耶稣的母亲一起出现

²¹¹ 《圣经·约翰福音》2:1-11.

²¹² 该段经文亦见于《圣经》马太福音 12:47-50，以及路加福音 8:19-21。

213。通过祂的话，耶稣其实是在表达：人与祂真正的连接，并不来自血缘，而来自是否认同并践行祂的教导。

(54) 即使在那个时代，这件事本身也足以引发很多关于耶稣与母亲关系的讨论。所以，这段故事后来被反复提起，也借此传播了许多重要观念。

(55) 我之所以相信《圣母秘福音》，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逻辑和智慧，已经超出了普通人类作品能够达到的程度。在真正读它之前，我就已经听说过它被称作“梵蒂冈秘密文献”的传闻。而当我阅读它的时候，我几乎像进入一种恍惚状态一样深深沉浸其中，对书里的内容产生了极强的共鸣。我甚至仿佛真的在人群里拼命寻找耶稣，并在通往加略山的路上与祂迎面相遇。除此之外，它与《圣经》中的福音书、一些灵性主义文本之间的呼应，以及对《旧约》的精准引用，也都让我更加相信它的真实性。

(56) 在我看来，耶稣代表着人类意识不断成长的道路。祂之所以不断向人提出问题，是因为祂希望人能够真正思考、真正学会推理。祂教导的是一种新的家庭模式——这种关系不再像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那样建立在利益和控制之上，而是建立在爱之上。

(57) 父母权威常常被体系所利用，沦为一种虚伪地控制他人的工具。例如，很多人不教孩子如何独立做饭，因为这种体系鼓励依赖与人对人的剥削。有些人甚至觉得，如果孩子学会了做各种事情，将来就容易被人“当佣人使唤”，所以干脆什么都不教。但实际上，一个人拥有自己做事的能力，恰恰是一种自由。

(58)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的善良只留给自己的家人，却总等着别人来服务自己，那我们其实并不能算真正善良。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提到童子军精神，因为它强调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善行和独立，而不仅仅是出于自私目的。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能大大减少一个人将来去剥削别人的可能。那些真正学会行动、学会自立的人，也更不容易变得虚伪，因为他们不需要靠欺骗来满足自己。

(59) 玛利亚象征着“新的盟约”。在这种象征里，人不再只是“罪之子”，而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一个诚实、正直地承担家庭责任的妻子与母亲形象，对于建立健康的女性观和家庭观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连“母亲”都无法让人产生信任，人就很难真正获得内心的稳定，也很难成长为更好的人。

(60) 在我们的社会里，很多“奴役关系”其实都起源于压迫性的家庭结构。孩子从小被要求无条件付出、服务别人，却得不到真正的尊重，还常常伴随着贬低和羞辱的话语。而很多女性

213 圣地亚哥·马丁：《圣母马利亚的秘密福音》，第157页：“他比约拿更伟大，比所罗门更伟大！”我的亲人愤怒地喊道。‘太过分了！他疯了，如果我们不阻止他，他会让我们所有人，甚至整个以色列蒙羞。’在人群的骚动中，有人转身让他们安静下来：‘他在讲撒旦——安静，让我们听。如果你们不相信，那是你们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因为我们亲眼见过他行的许多神迹，连所罗门甚至大卫都无法与他相比。’我的表兄弟们继续抗议，骚动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更加激烈。于是他们表明身份：‘我们是他的家人，我们来自拿撒勒，他的母亲也在这里。’我的心猛地一跳。他们怎么敢把我卷入这场混乱？怎么敢提到我的名字，仿佛我认同他们、怀疑我儿子的身份和意义？但我无能为力。一旦确认我在场，而又无人认识我，这个消息便迅速传开。‘是他的母亲，’有人低声敬畏地说道，并为我让出一条路。终于，有人靠近耶稣，对他说：‘看，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面，要与你说话。’”

，在婚姻里也会继续遭遇同样的对待。但问题在于，这些女性后来往往又会成为母亲，而母亲恰恰是整个社会最难被替代的支柱之一。于是，如果一个母亲开始相信“自己天生就该被奴役”，她很可能会把这种观念继续传递给丈夫和孩子，让整个社会不断重复这种压迫循环，再一次把下一代培养成习惯服从和服务别人的人。

(61) 很多时候，父母和长辈之所以会那样对待孩子，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当年也是这样被对待的。他们把不公和压迫一代代延续下去，也因此制造出越来越深的隔阂与敌意。很多人潜意识里觉得，既然自己曾经像“奴隶”一样活着，就必须再把这种东西转嫁给别人。而整个社会体系，又通过极端个人主义不断强化这种逻辑，阻碍真正健康的家庭关系形成。可事实上，一个更简单、更真实的道理是：没有人生来就是奴隶，而这个世界本来也足够丰盛。

(62) 如果父母之间没有真正的友爱，他们看起来就像只是“拥有孩子的人”；而如果孩子和父母之间没有真正的友情，他们又会像只是等待继承财产的人。我们不能把孩子培养成压迫别人的人，也不能把他们培养成习惯被压迫的人；同样，我们自己也不应该被孩子“奴役”。因为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任何形式的奴役，其实没有人是真正自由的。

(63)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家庭权力”——它应该建立在尊重、自由和爱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压迫之上。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就能打破这种一代代延续下去的支配循环，也能通过培养更加独立、更加健康的人，慢慢改变整个社会。愿事情能够如此发展吧！我听见“阿门”了吗？阿门。

章后一夏娃对玛利亚

(1) 在今天的社会里，依然残留着很多“基督之前”的思想，而这些东西之所以一直存在，是因为有一种反基督式的社会体系在延续它们。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这个故事早在耶稣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直到今天还在塑造我们的社会。它建立起一种像“问题家庭”一样的社会结构——建立在谎言之上，并不断通过家庭神话放大人的心理扭曲与焦虑²¹⁴。

(2) 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其实同时存在着两套彼此对立的精神与哲学体系：一种建立在奴役之上的“夏娃体系”，另一种则是建立在解放之上的“玛利亚体系”。在“亚当与夏娃”的体系里，神更像是一种控制和奴役人的存在，而夏娃则象征着那个把人引向错误、让人彼此束缚的“敌对女性”，所以她成了支配体系的象征。基督教则试图取消亚当和夏娃作为“人类父母”的地位²¹⁵，用上帝与玛利亚来取代他们，让玛利亚成为新的象征。因此，基督教实际上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家庭观，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观。

²¹⁴ 曼诺尼 (M. Mannoni) 多次强调家庭神话在精神病发生中的作用。根据她的观点，在前两代人中，象征化不足的叙事已经被构建，这种影响可能导致儿童发展为精神病。（《精神科医生、他的“疯子”与精神分析》，里约热内卢：Zahar出版社，1974年，第43页）“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出生，并不是进入一个为其开放、可以自由发展与个体化的位置，而是被安置在一个预先设定的位置中，这一位置属于某种家庭神话，该神话预定后代承担特定功能，而忽视其自身愿望。这种命运通过命令、预言、誓言等形式被象征化，并对孩子产生无意识的强制作用，形成一个‘完整的命运装置’（同上，第159页）。孩子往往在试图逃离时反而更深地陷入其中，类似俄狄浦斯模式（在这一意义上更接近精神病模型）。”参见：奥拉尼耶 (Aulagnier) 《解释的暴力》，里约热内卢：Imago出版社，1978年。（BUCHER, 2012）

²¹⁵ 《圣母秘福音》圣地亚哥·马丁著，第190页（作者译）——“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陷在无休止的冲突之中，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在最初那一天被蛇诱惑开始，一切便已经如此。”

(3) 当耶稣称自己为“人子”时，我认为祂真正想表达的是：祂属于人类，而不属于那个压迫性的旧体系。因为在那种旧体系里，人仿佛都诞生自一个冷漠、敌视人的“母亲”，于是大家活得像孤儿一样。

(4) “夏娃体系”建立在敌对和支配之上——人与人互相控制；而“玛利亚体系”则建立在友爱和兄弟般的爱之上，这其实也是基督教最核心的基础。压迫性的体系，会教人利用友情，把人与人的关系慢慢变成一种奴役关系。耶稣之所以遭到反对，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祂打破了当时犹太社会里很多带有隔离性质的观念，比如排外、极端轻视女性，以及对某些人的歧视。也许，最接近耶稣思想的犹太群体，其实是艾赛尼派——毕竟，“Essenes（艾赛尼）”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联合、合一”的含义。

(5) 耶稣的教导，本来应该是人类精神建设最重要的基石，因为祂试图为人的内在冲突提供真正的答案。但“夏娃体系”不断扭曲这些教导，因为历史往往是由掌权者书写的。而那个早在耶稣降生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体系，其实直到今天仍然在主导世界。

(6) 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这种体系影响下逐渐远离了灵性。大学虽然宣称自己“中立”，但很多时候其实遵循的是一种偏向无神论的思维方式。所以，人类的知识发展到今天，依然像只成长了一半——因为它被一种有限的道德观限制住了。

(7) 比如说，耶稣的故事主要是由罗马人和犹太人的视角流传下来的，而他们当时都把耶稣看成一个扰乱秩序、破坏摩西律法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连使徒们也会为了自己的民族做出妥协，因此他们的记述也未必完全真实。这也导致后来的某些基督教流派，依然保留了很强的犹太式思维。

(8) 也正因为如此，保罗才会被很多人视为耶稣“最后的门徒”——那个真正建立起基督教会的人。他确实曾正面挑战犹太式的分离主义，而且他也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因为他自己原本就曾参与迫害基督徒。他非常了解犹太人的思维方式。

(9) 而只要“亚当与夏娃的神”依然压在基督的神之上，我们的社会就连“精神进化大楼”的第一层和平——都还没有真正建成。我们至今仍停留在最底层，停留在人类彼此伤害、彼此杀戮的阶段。

(10) 耶稣所展现出的上帝形象，其实和当时受亚当与夏娃体系影响的犹太人理解中的神完全不同。在《圣母秘福音》里，耶稣曾引用《以赛亚书》，批评犹太社会中过度依赖仪式性献祭的做法²¹⁶，并表达了上帝对这些行为以及其背后虚伪心态的厌恶²¹⁷。

(11) 即便如此，耶稣也并没有否定摩西十诫²¹⁸。祂真正做的，其实是让人们对这些诫命有了更深、更完整的理解。而这也恰恰说明，当时那些追捕祂的人是多么缺乏理

²¹⁶ 《圣经》，以赛亚书 1:11-14 —— 对《利未记》中祭祀仪式的批判。

²¹⁷ 圣地亚哥·马丁：《圣母马利亚的秘密福音》，第118-119页：“父啊，您难道看不见吗？上帝向我们民族启示的核心，并不在于律法、圣殿，甚至也不在于对所有律法条文的严格遵守。最重要的是爱。如果没有爱，如果存在不公、怨恨、仇恨、嫉妒等等，那么无论我们献上多少祭品、祈祷多少次，上帝都不会悦纳我们——祂又怎能悦纳呢？”“这并不是要毁掉我们已有的一切——圣殿、律法以及其他一切——而是要净化它，使其摆脱一切不合上帝心意的东西。”

²¹⁸ 雷娜特·约斯特·德·莫赖斯：《无意识的钥匙》，第四部分，第297页：“关于道德与宗教价值，这些价值也趋于相似，并与摩西传下来的‘十诫’相一致。因此，这项研究并未证实所谓的道德相对主义的真实存在，反而揭示出一种跨越时间持续存在的稳定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研究通过其数据（虽未直接表述）表明，人类内在存在一种伦理代码，其基本内容并非由习俗塑造，也不依赖社会学习。尽管价值观在青年时期可能发生变化，但在成年后会重新趋于统一。”

性。我们也应该记得，真正让犹太人和祭司愤怒的，是耶稣曾不断强调的一点：祂拥有比先知更高的属灵权威²¹⁹。

(12) 比如，“不可制造神的形象”这一诫命，本身其实非常合理。因为如果上帝本来就是不可见的，那么任何试图把祂具体画出来、塑造出来的行为，都难免会扭曲祂真正的样子——哪怕对于那些只相信“内在之神”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与此同时，真正的“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其实也不可能被真实呈现，因为那本身是人类残酷与恶意的创伤性见证。而各种艺术化的再现，很多时候反而会让人逐渐失去对这种痛苦的真实感受。

(13) 至于“守安息日”这条规定，在我看来同样有它合理的一面。耶稣其实也没有违背“不要在安息日做沉重劳动”这一点。但如果把安息日理解成“什么都不能做”，那就会变成一种束缚。因为有些事情，我们本来就不能停止去做——因为那是善，也是必要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明明该行动却什么都不做，那么某种意义上，其实也等于在作恶。所以，当面对真正必要的事情时，无论是哪一天，人都应该去行动²²⁰。

(14) “夏娃体系”会不断“吞噬”基督教，把它吸收进自己内部，再重新包装。这一点，和荣格曾描述过的那个象征非常相似²²¹：拥有耶稣式形象的英雄，被怪物吞进肚子里。这个体系会接受基督教的外壳，却不会真正把它完整地呈现出来。

(15) 那些建立“夏娃体系”的支配者，直到今天依然在迫害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把真正的基督精神视为对奴役体系的威胁。而这种体系，也让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病态的集体自我²²²。但与此同时，基督教殉道者所承受的痛苦，并不一定比压迫他们的人更多。因为当一个人拥有更高的信念，并且摆脱了仇恨与负面情绪时，那种精神状态本身就能减轻痛苦——哪怕死亡的疼痛，本来就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

(16) 即便如此，“夏娃体系”依然会故意扭曲耶稣和殉道者受苦的意义，让人们去崇拜“痛苦本身”。比如现代超级英雄，很多都被塑造成孤独、与人隔绝的人物。而这种设定，其实是在潜移默化地反对“人与人真正联合”这件事。

(17) 这一点，也能从很多人对复活节的理解里看出来。很多人至今仍没有真正意识到：复活节真正想表达的核心，其实是“生命通过上帝获得更新”，而不仅仅是十字架上的牺牲。耶稣通过复活节所展示的是：死亡后三天会迎来复活——这里的“三天”包括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之后，一个人要么进入永恒的生命，要么进入地狱。而这里的“地狱”并不是永恒的，它更像是旧人格的死亡与净化过程。

²¹⁹ 《圣经》：约翰福音 8:53 ——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先知们也死了；你把自己当作什么人呢？约翰福音 8:58 ——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已经存在了。马太福音 12:42 —— “乙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和这个世代一同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来到，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你看，这里有一位是比所罗门更大的。”

²²⁰ 马太福音 12:11-12 ——¹¹ 耶稣回答：“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他仅有的一只羊在安息日跌进坑里，会不把羊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贵重得多了！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

²²¹ 荣格：《接近无意识》，2002年，第72页。

²²² 雷娜特·约斯特·德·莫赖斯：《无意识的钥匙》，第一部分，第83页：“为了维护人类内部秩序，无意识本身具有自我审查与自我惩罚的功能。当个人自我发生价值颠倒时，这些机制会自动被激活。这是一种存在层面的防御机制，因为在人类内在结构中，价值体系的颠倒等同于自我毁灭的过程。”

(18) 耶稣其实也反对一种犹太观念：认为“最后的日子”或“最终审判”会意味着整个世界的终结、人类的最后一天。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在一切结束时同时接受审判，那某种意义上，其实更像是一种集体性的毁灭。这种观念，更像属于“毁灭之神”²²³，而不是创造万物的神——它属于亚当和夏娃的神，而不属于耶稣所启示的神。

(19) 耶稣对抗这个体系的方式，其实非常深刻。祂把智慧带到世界上，让人类的“社会自我”开始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与矛盾，用心理上的冲突去慢慢治疗社会本身的病。就在祂复活后的几十年里，犹太人之间爆发了内战，而罗马人以及其他统治者，也开始更激烈地迫害基督徒。这些外部与内部的冲突，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真正展开的。

(20) 后来，当罗马帝国发现自己无法通过十字架和竞技场彻底消灭基督教时，它改变了策略。它开始让基督徒把重点放在“哀悼耶稣之死”上，而不是庆祝祂的复活。于是，“基督教是一种悲伤的宗教”这种印象被慢慢植入人们心里，而对复活与永生的信念，反而被放到了次要位置。

(21) 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自我”依然处在这种冲突之中。世界上很多地方，基督徒仍然会遭受残酷迫害。而且，很可能有许多人在精神上已经“死去”，却仍在另一个世界里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最后审判日”。但如果有一天，所有基督徒都真正意识到：所谓“最后一天”，其实就是死亡后的第三天，那么人类也就真正跨越了死亡本身。

(22)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哪怕充满缺陷——其实都在上帝的计划里，沿着某种进化的方向前进。上帝始终掌控着一切，也在引导社会中的各种冲突。比如现代色情文化的大规模泛滥，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对过去那种虚伪清教主义的反弹。过去，人们常常仅仅因为别人谈恋爱、拥有感情关系，就对其进行羞辱和诋毁。而这种极端，最终往往会把社会重新拉回平衡。随着时间推移，当人们对这些东西逐渐厌倦，公开的色情文化自然也会慢慢衰退。

(23) 甚至巴西当年的军事政变，在我看来也有它自己的历史作用。统治者为了利益而加强对大麻的打压，但某种意义上，这也间接阻止了那个时代的巴西被大量更危险的化学毒品淹没。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更清楚地区分什么是毒药、什么是药物，但在当时，人们还做不到这一点。比如 Janis Joplin 来到巴西时，就正在努力摆脱海洛因成瘾²²⁴——因为当时巴西并没有那么容易获得海洛因。

(24) “夏娃体系”尤其贬低女性作为母亲的价值，在女性的性与母职之间制造冲突。已婚女性被视为被束缚的，未婚女性则被贴上放荡的标签，从而被贬低或污名化。这种结构使孩子无法接受母亲作为一个具有性的人，进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孤儿状态”。

²²³ 《圣经》，马太福音 9:13 ——“¹³‘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你们去想一想这话的意思吧。我来不是要召义人，而是要召罪人。”（参见何西阿书 6:6）

²²⁴ 詹尼斯·乔普林（1943–1970）：美国歌手与词曲创作人，以强烈的中音嗓音与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力著称。：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nis_Joplin。

(25) 而“母性”真正应该代表的，其实是通过尊严和人性的对待所带来的解放。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形象，正是在维系母亲与孩子之间那种建立在爱与尊重上的连接，与这种对女性和母性的贬低形成对抗。

(26) 与此同时，像 Catholic Church 这样的机构，很多时候并不会真正反对歌曲和舞蹈中的公共低俗化，却反而强烈反对避孕措施——这种矛盾，其实恰恰说明它仍然在支持某种支配体系。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助长了混乱的性关系，另一方面又让生育控制变得更加困难，最终把社会推向贫困、排斥和脆弱的循环之中。而为了让这种非人化状态进一步持续下去，整个体系又不会真正给予孩子们更多支持。

(27) Cálice 这首歌，就很好地表现了这种复杂性。它把“圣母的孩子”与“另一个女人的孩子”放在对立的位置上，暗示了一种社会与道德上的分裂。从语言逻辑上来说，这句歌词其实也会自然让人联想到一句带有侮辱意味的话——“妓女的孩子”。而这种表达，本身就带着一种针对女性血统的攻击，把各种邪恶、堕落和人格缺陷都归咎于女性。压迫性的体系，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妖魔化女性形象，把社会的问题都推到女性身上。下面，是《Cálice》中的一段歌词。这首歌由 Chico Buarque 与 Gilberto Gil 于1973年创作，并在1978年发行。

父啊，请把这杯拿走。父啊，请把这杯拿走。
父啊，请把这杯拿走。这杯盛满鲜血的红酒。（副歌重复）

我如何饮下这苦涩的酒，吞下痛苦，承受挣扎？
即使我闭口不言，胸口仍在作痛，
城市的沉默无人倾听。做“圣人的孩子”又有何意义？
倒不如成为“别人的孩子”，那是另一种现实，不那么死寂，
充满谎言，也充满暴力。

(28) “婊子养的”这种说法，本身就带着一种很深的社会暗示：有些人会被体系接纳、保护，而另一些人——尤其和女性血缘相关的人——则会被不公平地归咎于一切问题。说到底，这其实是一种针对“不是体系自己人”的迫害方式。它最终想建立的，是一个彼此保护、彼此包庇的关系网络。这种现象，我在公共部门里看得尤其明显——要么你是“被保护的人”，要么你就是被针对、被排挤的人。

(29) 在“夏娃体系”里，占主导的是各种负面的规则：恶性的竞争、对个人价值的贬低、边缘化，以及各种污名化。“夏娃的孩子”这个说法，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形容那些被这种世俗逻辑驱动的人。

(30) 在这种体系里，“圣洁”常常被误解成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压抑，用来打压一切真实、自然的生命表达。而“玛利亚体系”所理解的圣洁，则完全不同——它尊重生命本身，也尊重生命各种真实的表现形式，并强调建立在真正的爱与友谊之上的关系。

(31) “夏娃体系”创造的是一种充满敌意的环境，在那里，人不是被当成敌人，就是被当成满足自私目的的工具。而“玛利亚体系”所提出的，则是一条尊重个体的道路——在那里，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本质，以及自己爱人的能力，而被真正重视。

玛利亚体系：	夏娃体系：
— 相信一位宽容且使人获得自由的上帝。	— 相信一位不宽容、惩罚性、控制性的神。
— 代表源自人类意识中属灵与神圣起源的思想。	— 代表支配性的思想，把人等同于低等动物。
— 相信通过真理形成的自由信念。	— 相信通过谎言进行控制。
— 重视尊重、协作的沟通方式。	— 以不尊重的沟通与服从关系为基础。
— 相信“积极意志”推动社会进步（意志的统一）——善意使力量汇聚。	— 相信“消极意志”推动社会进步（压制他人意志）——恶意或不良动机导致竞争。
— 倡导生命、和平与爱的成长。	— 主要依赖对死亡的恐惧、愤怒与仇恨。
— 肯定人的价值（对人的认可）。	— 以“评判人”代替“认可人”（贬低人的价值）。
— “玛利亚的子女”=人的子女=真正的人；关系建立在人性与友谊之上。	— “夏娃的子女”=支配体系的子女=社会之子；关系充满非人性与敌意。
— “友爱之子”=圣洁之子——通过内心认同与父母合作。	— “控制之子”=罪之子——通过强迫与父母合作。
— 象征天堂。	— 象征地狱。
— 象征自由。	— 象征奴役。

(32) “夏娃体系”具有攻击性。奇科·布阿尔克曾被递上“毒芹之杯”，劳尔·塞沙斯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一点在他的歌曲《法外牛仔》中有所体现²²⁵。那首歌仿佛是在暗示：他并没有力量真正去对抗富人和掌权者。

(33) 歌词中提到的“杜兰戈小子”²²⁶ 是一个来自漫画和电影的角色，象征反抗暴政。“当市长”象征被选中，“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直接指向基督教，而“创造历史”则意味着发动变革——而他选择回避这一点。总体来看，这首歌暗示他拒绝推动基督教式的解放，因为这会遭到体系的反对，而他也害怕因此被暗杀。

(34) 与此同时，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那些掌握权力的人逐渐阻止通过艺术去传播真正的基督精神，而媒体则开始越来越多地鼓励不可知论，以及对宗教本身的质疑。电影《万世巨星》²²⁷ 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较为隐性的例子。

²²⁵ 《法外牛仔》（Raul Seixas / Cláudio Roberto Andrade de Azevedo, 1987）“妈，我不想当市长，万一当选了，说不定还会被人暗杀。我也不需要看新闻，我自己就能撒谎。我不想去招惹命运。爸，我不是想证明什么，我已经为我热爱的国家付出过，可大家还总是让我去付账。唉，可怜的人啊，这么早就走了。上帝保佑，我害怕——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我可不傻，不会去当什么英雄。我已经打过我的仗了，我是个牛仔，一个法外牛仔。“杜兰戈小子”只存在于漫画里。谁想留下就留下吧。至于创造历史？那是你们的事。”

²²⁶ “Durango Kid”——虚构的牛仔角色，见于电影与漫画：https://pt.wikipedia.org/wiki/Durango_Kid。

²²⁷ 《万世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 1973）：英国音乐电影，由诺曼·杰维森执导，根据同名摇滚歌剧改编。影片以嬉皮士文化为背景，讲述耶稣受难前一周的故事，从他进入耶路撒冷到被钉十字架，融合了现代与古代元素（如机枪与罗马长矛并置），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sus_Christ_Superstar。

(35) 与此同时，社会也开始通过大量的“神经语言式暗示”去影响大众。从“真正的爱情=情色爱情”，到“男女关系里唯一存在的东西就是性”，这些观念不断被重复灌输。²²⁸最终，它们一步步把人引向一个结论：爱其实并不存在。可事实上，第一个暗示这一点的，恰恰就是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本身。

(36) “夏娃体系”会诱导人们亲手毁掉自己的人际关系，因为它让人逐渐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真正友谊”的概念。比如那句被广泛传播的话：“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在我看来，这句话其实同时伤害了基督教里的第一和第二诫命，因为它把人与上帝的友谊、人与人的友谊，都从最重要的位置上移开了。

(37) 很多民间俗语，其实也成了这种体系传播观念的工具。因为这些话人人都会说，而且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个社会的行为方式。比如“欲望总会过去”和“只要等待，总会得到”，这些说法其实都在诱导人变得被动、不行动，而这也正符合“夏娃体系”想让个人意志停滞下来的目标。

(38) “夏娃体系”建立在权利不平等之上。虽然我们拥有不少好的法律，但现实里，我们却始终无法真正让有权势的人也服从法律。而这一点，本身就违背了基督教里的第二诫命——因为那是“命令”，不是“建议”。所以，失衡最终一定会以冲突的形式反弹回来，推动事情重新走向平衡。而这种冲突，也会迫使很多人慢慢失去原本的冷漠与麻木。

(39) 直到今天，人类似乎仍然需要通过痛苦，才学会变得更有同情心。在《圣母秘福音》里，玛利亚在教会建立前那段动荡时期曾说过：“我告诉你们，苦难具有救赎意义。并不是因为上帝喜欢看我们受苦，好像祂是那些希腊或罗马神话里的残酷神明一样。上帝真正喜悦的，是我们的幸福²²⁹。”

(40) 暴政会让所有人都痛苦，包括暴君自己。因为暴君会时时刻刻盯着别人是否满足自己的意愿，而每一次哪怕最小的“不顺从”，都会让他痛苦。很多时候，人恰恰会去伤害那个本应成为自己平衡点的“邻人”。这就像一条腿去绊倒另一条腿一样——亚当和夏娃之间也是如此。而正因为这种模式被写进了《圣经》，我们的社会才不断重复这种彼此控制、彼此利用的关系模式。这也让社会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偏离真正的基督精神。

(41) 按照耶稣所展现出来的上帝形象，祂其实正好和“夏娃体系”相反。祂反对罪恶，却不会因为人的错误就彻底否定一个人。祂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本来就是灵魂的一部分。祂一直在努力把从自我毁灭里拉出来。耶稣曾赶走圣殿里的商人²³⁰

²²⁸ 在这次宣传活动中，使用了“Love Is...”中的角色，这是Kim Casali创作的作品。第一幅连环画于1970年1月5日发表在《洛杉矶时报》。来源：euteamohoje.com.br。可在以下网址查看：
https://loveiscomics.com/#google_vignette/。

²²⁹ 《圣母玛利亚的秘密福音》，Santiago Martin著，第218页。

²³⁰ 《圣经》，约翰福音 2:13-25。.

，因为祂反对拿信仰做交易²³¹；祂也说过，祂给人的“担子是轻省的”²³²，因为祂希望人能够成长、反省自己，而不是活在压迫里。

(42) 很多时候，把痛苦带进自己人生里的，其实正是我们自己。人活在肉身里的时候，很难真正看清自己释放出的恶意指和伤害。有些人总希望别人倒霉，希望别人陷进无法解决的问题里。可慢慢地，这种东西也会回到他们自己身上。

(43) 比如有些人会说：“只要还有酒、还有肝，我就继续喝。”可等身体死去之后，人的精神状态却不会一下消失。那时候，没有了酒精麻痹自己，一个人内心长期积累的痛苦和混乱，反而会变得更加明显。在精神层面，一个人长期活在什么情绪里，最后往往就会被带进什么样的世界。一个被愤怒和怨恨吞没的人，最后看到的世界，也会越来越黑暗。

(44) 很多人把这些后果叫作“上帝的惩罚”，因为“夏娃体系”一直在故意塑造一个让人恐惧的神。它让人觉得，人和人之间不是因为爱才互相帮助，而只是因为钱、利益和交换。久而久之，人们开始觉得：服务别人是低人一等，而被别人服务才代表高贵。于是，有些人被当成天生就该付出的人，另一些人却被当成理所当然该接受一切的人。

(45) 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容易被各种对立情绪带着走。现在常说的“政治正确”²³³，表面上是在反对歧视和偏见，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它很合理。但很多时候，它又会用同样激烈、同样不宽容的方式去对待意见不同的人。于是，它一边说自己在反对压迫，一边又制造新的对立。

(46) 最开始的时候，抽烟、喝酒、说脏话这些行为，其实都不算“政治正确”。后来，这个词慢慢变成了保护少数群体、反抗体制的一种象征。但在我看来，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现在，很多过去会被批评的行为，反而又被包装成一种“正确”。而且，

²³¹ 《圣经》，马太福音 11:30 ——“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²³² 摘自Renate Jost de Moraes所著《通往无意识的钥匙》（数字版，第84页）第一部分“无意识”，1.7“无意识的人类学维度”：“当价值发生颠倒时，无意识中的自我审查和自我惩罚机制会通过身心失衡的症状表现出来，而这些症状往往对药物和其他治疗方式具有抵抗性。这会引发其他重要的痛苦形式，例如对死亡的恐惧、存在性焦虑以及类似的困扰。因此，我们的治疗通过经验揭示了一些关于人性的真理，这些真理跨越时间、历经千年依然存在。通过无意识的自我审查，我们对自己的约束往往比任何外在的社会或宗教机构都更加严格。”

²³³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一些表达方式、政策或行为，它们的目标是避免冒犯、排斥或边缘化那些被认为处于弱势或长期受到歧视的人群，尤其是和性别、性取向、种族等相关的群体。这个词后来在美国逐渐流行起来，尤其是在《The New York Times》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之后，更广泛地进入公众讨论。1987年，Allan Bloom出版了《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围绕“政治正确”的讨论开始变得更加激烈。之后，Roger Kimball的《Tenured Radicals》以及保守派作家Dinesh D'Souza在1991年出版的《Illiberal Education》进一步推动了相关争论。在《Illiberal Education》中，D'Souza批评了一些自由派倾向的大学与文化运动，认为它们通过强调“受害者身份”、推动平权措施，以及修改学校和大学课程内容等方式，过度地使用语言与意识形态来影响教育和社会。资料来源：Wikipédia. Disponível e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tical_correctness.

现代“政治正确”很多时候正在不断强化一种情绪：让弱势群体永远觉得自己只是受害者，并把愤怒持续扩大。

(47) 这一运动被系统所推动，用来实践某种性别或群体偏见，并对被视为“特权者”的人进行报复。这些群体创造了许多带有负面含义的词语。例如，“mansplaining”²³⁴ 和“maninterrupting”²³⁵ 等词，被视为女性对其所认为的反女权行为的一种反击。“发言空间”（或“发言权”）²³⁶ 以及“文化挪用”²³⁷ 等表达具有分裂性；“取消”²³⁸ 这一说法则助长了社会排斥；“女性身体赋权”²³⁹ 这一说法指向对女性身体的性感化——甚至物化；而“to slay”（或“clap back”）²⁴⁰ 则鼓励人们以激烈方式压制对话，打断讨论。

(48) “政治正确”的做法试图维护黑人文化，却拒绝使用“negro”（黑人）一词，而以其他词语替代。问题在于，这整套论述本身存在缺陷，因为这些替代词同样带有种族色彩。相反，更合理的方式或许是采用新的表达，例如描述一个人的肤色较深或较浅。

(49) 将脏话推广为可接受语言，也是政治正确运动中一个颇具争议的方面，因为这些词语本身带有明显的攻击性，尤其是针对女性。脏话往往被当作填充词使用，替代名词，这对我们并无益处，因为它会让大脑逐渐遗忘词汇。许多受人尊敬的人也喜欢说脏话，甚至认为不说脏话的人是虚伪的。

(50) 因此，当今的“政治正确”通过制造某种沉默氛围，并对什么可以说、必须如何说加以规范，已经偏离了其最初旨在缓和语言冲突、改善行为的目标。相反，它更像

²³⁴ “Mansplaining”——指男性以居高临下或带有说教意味的方式向女性解释事情，从而贬低对方。

²³⁵ “Maninterrupting”——指男性以压制性的方式打断女性发言。

²³⁶ “发言空间”或“发言权”在巴西的语境中，大致相当于美国所说的“亲身经验”，两者都指源于对某一问题或情境的直接经历而获得的发言权威与正当性。不过，在日常语境中，这一概念常带有“限制谁有资格发言”的意味。例如，有人可能认为，只有女性才可以批评女性主义。

²³⁷ “文化挪用”——从更广义来看，它强调一种权力不对等的现象：主导群体采用边缘文化的元素，往往将其商品化或误读，而这些文化本身在实践其传统时却仍遭受歧视。例如，资本主义者以表现嬉皮士为名，在《Hair》和《Jesus Christ Superstar》等电影中歪曲了其形象。不过，在更日常的语境中，这个词常被理解为限制人们使用其他文化元素的权利，尤其是在涉及意识形态或象征层面时。例如，如果我作为一个白人把非洲大陆纹在身上，可能会因此受到批评，仿佛这不是我的权利，而只是黑人专属的权利。

²³⁸ “取消”（cancel）——指因为被认为“不政治正确”，而在网络上对某人进行社会性排斥或抵制的行为。

²³⁹ “女性身体赋权”——指女性通过展示自己的身体来体现其魅力与吸引力，例如通过舞蹈等方式。

²⁴⁰ “压制性回应”（shut down）——指某人以强硬甚至带攻击性的方式打断或终止他人的论述或观点表达。

是一种制造分裂的工具，而不是促进对话与相互理解的方式。它似乎更关注语言之争²⁴¹，而非推动建设性的讨论。

(51) 那“谎言”呢？它真的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也属于一种“政治正确”吗？如果一个人说自己从来不撒谎，那本身往往就是一种虚伪。但谎言应该只是例外，而不能变成习惯。因为一旦人总是在说谎，别人就再也无法真正信任他。只有当谎言极少出现时，人们才会明白：那并不是一种攻击，也不是为了操控别人。

(52) 如果我们真的想改变这个体系，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变成“政治正确的人”，而是真正做一个“正确的人”。而如果我们想在说话方式上更成熟、更有分寸，就必须学会怎么表达。只要发现某种说法已经偏离了真实和逻辑，我们就应该愿意调整它。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带着理解去交流，而不是像某些运动那样，把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

(53) 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正确”，其实是不让自己的情绪在话还没说完之前就先“爆炸”。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在愤怒里依然保持沟通，而不是让情绪毁掉交流本身。

(54) 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更和平的世界，那么我们也必须学会使用那些能把人带向上帝、带向善意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对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负责²⁴²。

(55) 最后的晚餐里²⁴³，耶稣亲自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人应该彼此服侍、彼此照顾。他们之间应该是协调与合作，而不是谁支配谁。没有友谊、没有兄弟般的爱，人甚至很难真正像“人”。因为没有谁只是属于自己母亲的孩子——从更大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是人类的兄弟姐妹。

(56) 真正的“兄弟情谊”其实有能力建立一个远比现在更好的世界。在那样的世界里，一个人的成功不会只是属于他自己，而会被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庆祝。

(57) 真正的上帝，会让我们不再只把人分成“施害者”和“受害者”。因为很多时候，这两种身份本来就会互相转换。甚至，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也可能被当成“坏人”去迫害。真正的解放，应该是给所有需要被当成人来对待的人，一种真正的人性关怀²⁴⁴。

(58) 耶稣来到世上，其实正是在告诉人们：这种病态的支配关系应该结束了。但如果人类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哲学——也就是改变自己的“精神母体”。

(59) 在我看来，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是一种理想的“精神母体”。通过她对儿子的奉献，她展现出了七种成长层次：和平、爱、善意、信念、智慧、超越，以及普世性。她愿意接受自己将成为救世主母亲这件事，即使这会让她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这说明她拥有真正的信念。她也曾向自己的表姐伊丽莎白请教关于男性心理、婚姻关系和

²⁴¹ 《圣经》，提摩太后书 2:14 —— “你要在神面前把这些事提醒众人，叮嘱他们不要作无益的争辩；这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²⁴² 《圣经》，马太福音 12:36-37 —— “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因为你要照你的话被称为义，或定为有罪。”

²⁴³ 《圣经》，约翰福音 13:1 至 17:26，以及哥林多前书 11:23-26。

²⁴⁴ 摘自 Renate Jost de Moraes 所著《通往无意识的钥匙》（数字版，第82页）第一部分“无意识”，1.7“无意识的人类学维度”：“当我们谈到正确使用自由时，是因为实际上，对于有意识且自由的个体而言，只有一个总体方向：选择那些引导人实现充分发展的道路。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持续不断地在价值、目标以及人生意义之间作出选择。任何在这一选择上的错误，都会逆转人性化的进程，并将个体推向动物化。”

养育孩子的问题。而这种愿意主动寻求自己所不了解之事的態度，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因为真正有智慧的人，会主动寻找自己需要的知识。毕竟，除了上帝，没有人什么都懂。

(60) 她在那个肮脏恶臭的山洞里，为了迎接耶稣的诞生而亲手清理环境，这表现出了她的平静、爱与善意。即使自己正处在最艰难的状态——即将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分娩——她依然努力保持内心稳定，去支持自己的丈夫，这是一种超越性的力量。而最后，当她接受自己儿子的死亡是为了整个人类时，她也展现出了真正的普世之爱。

(61) 当年耶稣开始传播自己的思想时，人们最难理解的一点，其实是：祂所推动的，并不是一场政治运动，而是一场精神层面的改变。政治通常围绕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运转，而灵性本身——至少从理想上来说——面对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某一个阵营。所以，真正应该引导一切权力的，不是利益，而是精神与良知。我们并不需要消灭社会管理本身，我们需要消灭的，是对人的压迫与侵占；真正需要的，只是尊重人。

(62) 玛利亚所代表的，是“人有权存在”高于“人必须服务于体系”。她象征着对人的保护。在“新约”所描绘的理想社会里，玛利亚式的价值观能够带来健康与幸福，因为它把耶稣的价值观当作一种理想的人类成长标准。与我们这个通过层级和支配来运作的体系相比，这种价值观更能让人的内心保持平衡，也让人的思维和精神状态更加健康。

(63) “玛利亚体系”是围绕“人”建立的，它更像一位真正关心孩子成长的母亲，希望孩子慢慢成熟、独立。而“夏娃体系”则刚好相反：人在那里是为了服务体系而存在，就像被控制、被束缚的孩子一样。很多人其实已经习惯并接受了这种模式，甚至会本能地维护它、抵抗改变。但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因为“亚当与夏娃”的那种关系模式，几乎已经变成了这个时代默认的行为标准。

(64) 由于这些观念长期被大规模灌输，很多人其实早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思考了。（2016年7月27日13:09——“干净的死亡”——我挺过来了！——又一次“交付”发生了²⁴⁵）。

(65) 耶稣真正想教给人的，是做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成为体系的一部分、成为它的附属品。祂鼓励人用自己的感官和经历去感受现实，而不是只依赖别人告诉你“现实是什么”。就好像祂在提醒人们：“相信你自己的感知吧，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谎言了。”

²⁴⁵ 关于日期的标注，是指在本书最初写作阶段的一次启示时刻，当时我听到了“洁净的死亡”这一灵性信息，并将其理解作为一种获得新信息的灵性许可。这发生在文本《双重六理论》提交之前不久。

图像 VII



旁边的插图指的是一套名为《小童子军图书馆》的杂志合集。1975年，基督教教育与童子军活动正逐渐兴起。为了推广童子军教育，这些面向儿童的杂志被出版出来。虽然封面上呈现出“家庭”的形象，但其内容却带有个人主义倾向。因此，其中的人物并不是父母与子女，而是叔叔与侄子——这是一种叙事手法，用来为他们之间的某些行为提供合理解释。

华特迪士尼公司。《小童子军图书馆》。圣保罗：Círculo do Livro S.A., 1975年。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是一个教学活动，项目名为“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学葡萄牙语阅读”。教师乌利塞斯请班上一位同学分享一个包含土著人物以及字母“i”发音的故事。爱德华多说：“我！我！我！”并讲述了一个故事：在他祖父母家附近的森林里，有一位行动非常迅速的土著人。当人们指着他说“i, i, i”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随后，老师使用“蜜蜂教学法”在黑板上引入字母“i”，学生们还排练了一段与字母“i”相关的歌曲与动作：“i, i, i, 土著人来了；i, i, i, 土著人来了；快速跳跃，跑进森林；快速跳跃，跑进森林。”



接着，乌利塞斯老师问是否有人能分享一个与眼镜和字母“o”有关的故事。安娜主动举手说：“我！我！我！”她讲述道，有一天她的奶奶把新眼镜掉在地上。很多人试图去捡，但都没能成功，结果眼镜被摔坏了。当大家没能抓住眼镜时，都发出了“哦！”的感叹。老师随后用“蜜蜂教学法”引入字母“o”。之后，他们到院子里排练歌曲：“O, o, o, 奶奶的眼镜；O, o, o, 奶奶的眼镜；已经坏了，只剩一边；已经坏了，只剩一边。”

